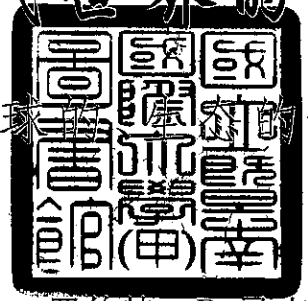


411 |  
9355:2

全球史译丛

#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述说



[美] 罗伯特·B. 马克斯 著  
夏继果 译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C211114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世界历史地图集

世界历史地图集



### 第三章 帝国、国家和新大陆， 1500—1775 年

1500 至 1775 年间，世界的组合方式在许多方面开始发生变 67  
化。首先，世界大部分地区被拖入了正常的、不间断的交往，其方式前所未有。世界上原先存在着几个“世界”：中国世界，印度洋世界，地中海世界，还有到那时为止尚不为亚洲人、欧洲人和非洲人所知的美洲。而在 1500 年之后，两条新的纽带第一次将全球连成了一个单一世界。1492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海开启了新大陆的大门，并且在美洲、欧洲和非洲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不过还有另一条名气稍逊的太平洋航线，自 1571 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之后，它把新大陆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些新纽带促进了商品、思想、病菌、食物和人口在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了一个充满生机但又非常特殊的新大陆，与旧大陆（即非洲—亚欧大陆）颇有差异。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 16 世纪的这些发展视为“第一次全球化”。

第二个大的进程是亚欧帝国的持续发展和生存。在 16 世纪，帝国仍然是将地球大部分地区置于人类控制之下的最为普遍的政

治形式。在人类曾经设计出的向土地要收成、增加人口数量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帝制是到那时为止最成功的一种。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生活在帝国中，而生活在民族国家里呢？这是因为西欧发展起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当然，最初西班牙人曾经控制着新大陆的许多地区，获得了大量资源，他们曾试图建立一个帝国，但这一企图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结果不仅扼杀了欧洲帝国的前景，而且推动了欧洲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第三个主要进程涉及欧洲主权国家体制的成长以及这一成长过程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与亚洲帝国相比，欧洲国家显然是既小且相当脆弱的机构，不可能与更大的帝国相竞争。它们的统治者如此贫穷，以至于不得不经常靠贷款维持军队给养；它们如此弱小，以至于在边界之内征集不齐全自卫所需的所有资源，如果西班牙人在欧洲成功地建立了帝国，并消除国家之间的战争，独立的欧洲国家很可能根本发展不起来。但事实上，欧洲内部国家战争体制有利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它在16、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发展起来，并且致使两国在18世纪陷入了长期的冲突。

到18世纪晚期，英国将出现在欧洲国家体系的巅峰。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帝国变迁将导致印度渐趋衰弱，中国渐趋强大。从全球视野来看，如此说是不为过的，即在18世纪末，两个结构相当不同的世界将开始发生碰撞：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一个是以英国为中心的欧美世界体系。<sup>①</sup> 19世纪将见证势力均衡天平向英国的倾斜，这一部分内容将在第四和第五章讲述。本章我们需要详述以上三大进程。

## 帝国建造者和征服者

1500年之后，亚欧地区的五大帝国——东部的中国、中部的俄罗斯、南部的印度莫卧儿帝国、西南部的伊斯兰萨法维帝国和西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急剧扩张，重新划定了亚欧大陆的政治边界，并且几乎结束了亚欧大陆游牧民族的武士角色。它们的扩张势头如此强劲，以至于到1775年，亚欧大陆的所有地区——欧洲最西边除外——几乎都在其中这个或那个帝国的控制之下，尽管它们并非同时或以同样的速度扩张，甚至有的帝国还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重大挫折。

### 俄罗斯和中国

俄罗斯和中国是帝国扩张中两个最为显著的国家，自1500年至1800年，俄罗斯领土面积扩大了三倍多，中国也扩大了一倍多。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始于莫斯科公国，1300年的莫斯科公国仅仅是用栅栏圈起的一块地方（称为“城堡”），四周围绕着绵延几千平方英里的森林，许多农场点缀其间。150年过后，莫斯科公国开始征服操罗斯语的其他公国，扩大自己的领地。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扩张发生于16世纪，当时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伊凡四世（“恐怖的伊凡”，1533—1584年在位）把帝国向东推进到乌拉尔山，向北至巴伦支海，向南达里海。经历了1600年左右的“困难时期”后，新建立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至1917年）使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然后一路推进到太平洋。18世纪的统治者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和卡

特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又把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向西推进,占领了波罗的海诸国,瓜分了波兰,并且粉碎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叛乱。

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帝国传统,中国的帝国始建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结束于20世纪初期,持续了2000多年的时间。尽管经历过多次分裂和被少数民族征服的时期,中华帝国的统治传统和统治技巧持久不衰。1500年时,1368年建立的明朝统治着中国,该王朝17世纪中期被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人征服。新成立的清朝旋即开始了一系列军事征服,乾隆皇帝时期(1736—1795年在位)尤甚。乾隆皇帝曾派兵进攻中国西北部和西部地区,打败了几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准噶尔部和藏族,并把这些部族及其土地并入帝国。至18世纪70年代征服战争被迫结束为止,中国的清帝国在吞并了西藏、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之后,疆域扩大了一倍,尽管新增加的领地要么是人口稀疏的大草原,要么是半沙漠地带,有的还是崇山峻岭。

中国是“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该体系包括东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未被正式合并进帝国之内的邻近地区。中国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种族特点各异且尚未建国的民族,定期派遣使团到清帝国都城北京,真心地和象征性地向中国皇帝进贡。中国统治者还把越南、朝鲜、爪哇甚至日本等邻国看成属国,希望也能接待它们的朝贡使团。朝贡使团不仅认可了中国在东亚的主宰地位,而且为官方和私人提供了诱人的贸易机会,把中国和属国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对远远超出它直接统辖范围的地区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实质性影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之内。<sup>②</sup>

### 莫卧儿帝国、萨法维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莫卧儿帝国、萨法维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彼此相连,跨越亚欧大陆南部和西南部。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经历过突厥王朝的统治。最初,突厥人是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一支,后来发展起足够的军事力量,逐渐征服了人口较为稠密的农业地区,如印度北部、波斯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高地。在前一章中,我已经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在这里,仅说下面的内容就够了。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地中海为中心继续向周边扩张,其中包括地中海北部海岸的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利凡特地区的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以及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的整个地中海南部海岸地区。与此类似,在16世纪早期,突厥种族的领袖们征服波斯,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征服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

第二,这三个王朝都拥护伊斯兰教的某个派别。奥斯曼土耳其人是逊尼派的虔诚信徒,萨法维人则信奉什叶派,而莫卧儿人(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至少在最初,不仅容忍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而且也容忍印度教的宗教活动和信仰。因此,这三个帝国都是兴起于8世纪的第一个伊斯兰教帝国的继任国。尽管如此,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什叶派的萨法维人之间教义区别如此大,以至于双方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先是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而后双方的冲突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00年。

第三,这三个伊斯兰帝国有着相似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征服战争的首领建立了新王朝,死后由他们的儿子以非常类似于中国制度的方式登上王位。另外,像中国一样,这些伊斯兰教国家也依靠任职于全国各地并对皇帝负责的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这三

个帝国都依赖多产的农业经济,统治者以向农民生产者和大地所有者征收租税的方式剥削农业产出的剩余物。

### 帝国的发展动力

尽管这些帝国都面临困境,尤其是被历史学家称为“17世纪中期危机”<sup>③</sup>的那种困境,但事实上,在1500年至1775年的这段时期里,即使伴随着兴衰,帝国依然是管理辽阔疆域之政治和经济的扩张性的、成功的组织形式。它们向人们显示,它们完全能够调动所控制的资源来提高和扩大统治王朝的权力并将其延伸至新的地区。的确,到1700年为止,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这种或那种帝国的控制之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俄罗斯帝国,其他所有帝国都由来自大草原的征服者建立,而反过来,这些扩张性的帝国又通过把剩余的游牧民族控制在帝国之内的方式,终止了游牧民族对帝国生存的进一步威胁。当然,甚至进入19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和其他民族仍能“造反”,甚至引起帝国的实质性瓦解,不过大的核心国家的势力正在瓦解着游牧民族的力量。帝国先前的发展动力之一,即导致其崩溃或受损的游牧民族入侵因此消失了。<sup>④</sup>

不过特定帝国本身固有的其他发展动力继续对帝国的兴衰发挥着作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死于1707年)达到顶峰。他死后不久,印度王公纷纷挑战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并且实际上宣布独立。这导致了政治力量的分裂,为欧洲人插足印度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这些内容。中国的势力在18世纪似乎是非常稳固的,尽管我们今天反思历史,会发现那时最高统治阶层的腐败正开始腐蚀政治意志,人口增长和经济困难的矛盾在18世纪末引发了一场大叛乱。镇压白莲教起义

的代价则使帝国面临的其他困难,在19世纪初显现出来。

从1500年到1800年,跨越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这几个帝国繁盛了三个世纪。尽管每个帝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但它们的确拥有某些共性。最为重要的是,帝国是一种统治大片疆域的政治体制,统治权归一个人所有(通常称为“皇帝”)。帝国疆域如此广大,包含如此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以至于皇帝只能通过中间人实施间接统治而非依靠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进行管辖(尽管中国皇帝的确试图以这种方式进行统治)。帝国在统治人民方面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所以以下事情的发生一点儿也不令人惊奇,即帝国发展起来,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应用,特别是在西部非洲和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甚至欧洲也抱着建立统一帝国的梦想。在第二章,我已论述过西部非洲的帝国,这里,我将把美洲和欧洲介绍到故事中来。

### 美洲

南北美洲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居住着许多民族。在人类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首次移居美洲之后的数世纪里,<sup>⑤</sup>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从游牧和采集社会到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sup>⑥</sup>因而这些民族也能在旧生态体制下创建最高水平的政治组织形式——帝国,这一点应该不会让我们太感到意外。在我们讲述的故事中,尤为重要的两个帝国是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地处山区,也就是今天的秘鲁和智利的印加帝国。(见地图2.1)

#### 阿兹特克帝国

墨西哥中部谷地拥有许多持续时间长且留下深刻印迹的文

明。最早的文明是出现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的奥尔梅克文明。公元 600—900 年左右,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包括城市、大金字塔和高度发达的农业,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之后的玛雅国家分裂成众多小邦国。公元 1100 年,托尔铁克人控制了墨西哥谷地,并在谷底北端建立了都城图拉。由于土壤肥沃,再加上周边山脉冰雪融化汇流成河,水源供应有规律,墨西哥谷地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吸引着北美各地的民族蜂拥而至。

1350 年左右移居墨西哥谷地的民族中有一支被称为墨西哥人,也被称为阿兹特克人。<sup>②</sup>作为文明程度低、农业生产能力差的后来者,墨西哥人被排挤到最贫瘠的土地上,确切地说是一片沼泽和一个湖泊,而且被认为是其他民族的附庸。墨西哥人由于用一位酋长的女儿献祭而酿成大错,被驱逐到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他们从湖床中挖掘烂泥,堆成了一块块漂浮土地(称为“浮动园地”),逐渐在特斯科科湖中部创建了一个岛屿,位于其上的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城址)最终发展起来。作为外来者,墨西哥人不得不自卫,因而变成了优秀的武士,尽管有时被别人雇佣,但他们一直在建造自己的防御工事,壮大自己的力量。

1400 年时,墨西哥谷地散布着许多好战的城市国家,有三四个国家是主角,而墨西哥人则充当外国雇佣兵和次要角色。直到 1428 年,他们与另外的两个部族建立了三方同盟,情况才发生了改观。那时墨西哥人已变得足够强大,他们开始征服和压制邻邦,并要求他们向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进贡。15 世纪中期,墨西哥的两个统治者伊茨夸特尔(1428—1440)和孟蒂祖玛一世(1440—1469)领导联盟,逐渐控制了整个墨西哥谷地及其周边地区。在 16 世纪早期的鼎盛时期,帝国约统治了 489 个附属国,总计人口

2500 万,所有附属国都得向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墨西哥人进贡。

因而,墨西哥的统治者从附属国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sup>73</sup>食物、纺织品、珠宝、毛皮、橡胶球、宝石和金银都流向特诺奇蒂特兰城,不过被征服民族这样做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否则会遭到惩罚。墨西哥人并不依靠官僚机构和同化政策统治帝国,而是使用恐怖手段,哪怕有一点反抗的迹象,他们都会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并且杀死俘虏,祭祀上帝。<sup>④</sup>所以,墨西哥人把帝国建构在剥削臣服民族的贡品,定期发动战争以及每天屠杀数百名(如果不是数千名的话)俘虏献祭的基础上。特诺奇蒂特兰城或许已经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城市,但是帝国自身的基础并不牢固,帝国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墨西哥人给臣服于它的民族所造成的恐惧心理。

#### 印加帝国

印加人在美洲建立的另一个帝国则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与墨西哥人和玛雅人不同,印加人没有发展起书写文字,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印加人的大部分历史来自 16 世纪早期欧洲征服者的描述,尽管如此,故事依然让人印象深刻。在 13 世纪中期,印加人(这个名称最初是他们首领的称号,不过后来欧洲人使用时将其意义扩大,代指整个民族)定居于环绕的的喀喀湖的秘鲁高地上,15 世纪发动了一系列军事征服,创建了一个大帝国,帝国疆域自北向南从现在的基多城延伸至现在的圣地亚哥,约 2500 英里。

与墨西哥人不同,印加人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文化吸收、同化被征服民族,强迫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盖丘亚语),并且任用职业性行政官员直接统治他们。印加帝国疆域狭长,覆盖南美洲太平洋高地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如此,它还是“垂直”的。秘鲁山脉高达

13000 英尺,一些城市坐落在 9000 英尺高的地方,印加人的村庄则次第排列在大山和山谷中。“垂直”不仅是帝国管理的挑战,也是农作物生长的挑战,由于不同高度的生态系统差异很大,不同地带只能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为了保证这样一个不寻常帝国的统一,印加人用碎石铺成山路,保证帝国信使和军队的来往。

令人惊奇的是,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印加人竟然没有真正的书写系统,反而发明了依据绳子颜色和绳结数量记事的独特方式,统治者据此记录重要的信息(人口,赋税以及政府征派的劳  
74 役),以保持帝国的统一。村庄之间的迁徙是被禁止的,货币和私人贸易的缺乏限制了私人财产和财富的增长。尽管这样,帝国本身却很富有,统辖着 1600 万人。

不过,像墨西哥帝国一样,伴随着扩张,帝国内部也出现了紧张局势。印加人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后裔,为了使死后的统治者高兴(也为了农作物生长),他的遗体被制成木乃伊,以便在重要场合或做重大决定时将它抬出来,从而保持与太阳神的联系。不仅如此,为了维持这类仪式,还要把被制成木乃伊的统治者的所有土地和财产赐予他的直系子孙。因而一个新登王位的印加统治者仅领有贫瘠的土地,他不得不靠征服来获得属于自己的新领地和臣民,这赋予印加帝国的扩张一种特殊的动力。当所有可获得的土地皆被征服,或印加军队遭遇挫败——他们穿越安第斯山东麓向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地区进军时被赶了出来——时,帝国扩张的脚步放慢了,王室内部的紧张局势也开始升温,1525 年一位印加皇帝死后不久就公开化了,引发了王位继承危机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战争。

到 1500 年为止,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都已牢固地建立起

来,并且相当强大,尽管两者都有缺陷。阿兹特克人把帝国建构在强征勒索被征服民族剩余产品的基础上,而印加人则因为一项制度,需要不断向外扩张,为新统治者夺取新领地以养活他的家族。但就在那时,西班牙人来了,当然首先是 1492 年的哥伦布,不过更为重要的是 1519 年的埃尔南·科尔蒂斯和 1531 年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们的到来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 美洲的征服和西班牙帝国

1500 年,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的人口达到 250000,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城市里拥有金字塔、植物园、运河、动物园、排污系统和每天约有一千人打扫的街道。特诺奇蒂特兰城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阿兹特克武士在被征服民族中造成畏惧心理,以保证食物和货物流向首都。但是这个庞大、复杂而强大的帝国却被埃尔南·科尔蒂斯率领的仅 600 名西班牙“征服军”击溃了,而在 16 世纪 30 年代,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甚至率领着人数更少的“军队”征服了印加帝国。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

1519 年,科尔蒂斯在今韦拉克鲁斯城附近的墨西哥海岸登  
75 陆。他听说内陆有大量的黄金,并且获知被阿兹特克人征服的人们能够为他提供情报、食物、船只和战士。阿兹特克皇帝孟蒂祖玛二世最初认为科尔蒂斯是一个下凡的神,拿出许多黄金作为礼物赠送给西班牙人,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在科尔蒂斯看来,“我们患有一种心脏疾病,只有黄金可以治愈”,因此,他们开始跨越陆地,远征特诺奇蒂特兰。

利用被征服民族对阿兹特克人的仇恨,科尔蒂斯将他们收编,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攻打阿兹特克人。尽管阿兹特克武士英勇善战,而且还发明了许多在墨西哥谷地行之有效的战斗武器,但最终还是西班牙人占据着巨大的技术优势:西班牙人有钢刀、剑和盔甲,阿兹特克人只有青铜武器和布盔;西班牙人有大炮,阿兹特克人没有;西班牙人有带轮子的车,阿兹特克人没有;西班牙人有马匹,阿兹特克人没有;西班牙人有“战犬”,阿兹特克人没有;西班牙人战斗是为了杀敌并征服其领地,阿兹特克人只有在势均力敌时才战斗,而且并不杀死所有的敌人;最后,西班牙人无意中带来了天花病毒,在1520年夏天引发了一场瘟疫,致使特诺奇蒂特兰城过半的居民死亡,阿兹特克士兵士气大落,而纪律严明的西班牙士兵瞅准时机发动进攻,占领了特诺奇蒂特兰城。

同样是几个因素凑合在一起,帮助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小团伙征服了印加帝国。<sup>⑤</sup>不过,早在皮萨罗到达之前的16世纪20年代,天花时疫就已从墨西哥传播至秘鲁,夺去了安第斯山脉大批印第安人的生命。皮萨罗登陆后,利用印加王位继承人之间的不和,诱使他们落入圈套,几乎将他们全部杀死。皮萨罗对最后一位印加统治者许诺,只要他交付足够的黄金就饶他不死,但在目的达到后就用绳子勒住他的咽喉,致使他窒息而死。

尽管我们用“征服”这个词来描述16世纪里发生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身上的事情,但事实是西班牙人的胜利既非迅速又不彻底,因为美洲的土著民族进行了持久而英勇的反抗欧洲入侵者的战争。印加人的反抗又继续了一个世纪,实际上,西班牙人在与佛罗里达的西米诺尔人交手中遭遇过几次失败,而且我们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也弥漫着印第安人的战争。确实,在某些方面,土著美洲人的反抗至今尚未结束,正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墨

西哥恰帕斯的事件所给我们的警示。即使未被彻底打败,即使持续的反抗为土著美洲人赢得了与对方谈判的机会,甚至在边缘地区赢得让步,但是,欧洲人和非洲人最终取代土著美洲人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民族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下文将详细予以论述。

### 哥伦布交流

美洲的征服导致了天然物品和食物的全球性交流,尤其是新大陆的食物进入旧大陆的农耕经济中。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辣椒以及其他食品迅速传遍亚欧大陆,丰富了平民和上流人士的饮食。例如,甘薯于16世纪中期传至中国,使那里的农民有可能不再只吃大米而将大米卖掉。毋庸置疑,新大陆的农作物传到旧大陆,使那里人口的增长成为可能,并且超出了原先的食物总量所能供养的人口。

不过哥伦布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交易;在其中,新大陆的土著民族似乎是输家,因为新旧大陆的碰撞使到那时为止相互隔绝的两个病源之间发生了联系。土著美洲人的祖先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移居美洲,那时有一陆地桥将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相连。数千年后,亚欧大陆发生了农业革命,将人类和家畜聚集在一起,为动物病原体向人类的转移提供了便捷途径,引发了包括天花、水痘和流感在内的一系列疾病。亚欧人染上了这些疾病,经过一段时间后,身体产生了一些针对这些疾病的免疫力。而新大陆的人们却没有进行这种尝试的机会,当冰河时代结束,融化的冰川使大洋的海平面上升,高过白令海峡的陆地桥后,美洲的民族就与这些疾病隔绝了。而在当时,这些疾病已经成为亚欧大陆现实世界中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一些疾病对那里的人们来说只是“小儿科”,大部分人都能很容易恢复健康。欧洲人经过数世纪已产生免疫力的疾病对于没有免疫力的美洲人(以及后来太平洋岛屿的人们)而言将是致命的伤害。

### 大灭绝

天花时疫削弱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并为西班牙人征服这两个帝国铺平道路。但这仅仅是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大毁灭的开始,它几乎将美洲土著居民根绝。据记载,从1518年到1600年,有17种主要流行病出现在新大陆,传播范围遍及从今南美洲的阿根廷到今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和卡罗莱纳州的广大区域。不仅天花,其他几种致命的疾病——麻疹、流感、淋巴腺鼠疫、霍乱、水痘、百日咳、白喉和热带痢疾——同样毁灭着南北美洲的人口。<sup>⑩</sup>不过疾病并不是西班牙征服之后的这个世纪里美洲人口减少的唯一原因,征服本身、美洲土著居民之间的战争、征服者的镇压、印第安人劳动力的强制征用和幸存下来的土著人口的低生育率都加剧了这一灾难。<sup>⑪</sup>

单就墨西哥一地而言,1519年,那里有2500万人,50年后,有270万人,一百年后,仅剩下75万人,只占最初人口总数的3%。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印加人、加勒比群岛居民(从日斯巴尼拉的阿拉瓦克人开始)和(现在的)美国东南部的印第安人头上,尽管程度不一。在17世纪之前,从欧洲引进的疾病是否毁灭了美洲东北部、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和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依然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不过,自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洲永久定居之后,疾病也折磨着那里的土著居民。简言之,在欧洲与新大陆发生接触

的这个世纪里,大片地区的人口锐减,使美洲失去了占1500年之前人口总数90%的土著印第安人。尽管我们并非确切知道在未与欧洲发生接触之前美洲到底有多少人口,不过,美洲千百万人的消失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劳动力供应问题

即使没有大灭绝,西班牙人在新大陆也将会面临劳动力缺乏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干体力活,而让土著印第安人心甘情愿为他们干活也不那么容易。天主教会解决了印第安人是否有灵魂问题的争论(裁定他们有灵魂)之后,奴役印第安人已不可能。尽管印第安人不再是奴隶,但他们却被强迫在西班牙人的田地或煤矿里劳作,西班牙人给他们提供食物、住处,承认他们的基督教徒身份,这种剥削制度被称为“监护制”(encomienda)。征服战争和大灭绝结束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补充性的制度——“征派制”(repartimento)。鉴于印第安人人数稀少且相隔甚远,征派制把印第安人驱逐进西班牙人所熟悉的以坐标方格形式排列的小镇里。这两种剥削制度为西班牙征服者和他们的后继者提供了充足的衣食来源。

### 白银

美洲的“发现”当然是一个偶然事件,哥伦布向西航行是为了到达亚洲,在路上偶然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不过哥伦布寻找亚洲的原因同样也是那些追随他到达美洲的人的目的:发财。这些西班牙人不仅偶然发现了南北美洲,而且偶然发现了无以计数的金银,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用它们做成了许多工艺品、武器和实用

品。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被打败后,这些金银制品皆被西班牙人占有。

当西班牙人所做的只是掠夺汇集在特诺奇蒂特兰城和库斯科城(原先印加帝国在秘鲁的首都)的金银,并加以熔铸,再用船只运回塞维利亚时,并没有印第安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因而,与大灭绝相伴随的还有大掠夺,这也是美洲被征服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人影响新大陆经济的显著特征。不过伴随着原先印加帝国(今玻利维亚西部)和墨西哥地区大量银矿的发现,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最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于1545年的波托西城。至1570年,波托西城就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150000人口的新兴城市(尽管海拔高达11000英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水银提炼技术引进之后,数千吨白银从波托西城运出。印第安人开采矿山,提炼矿石,他们或者是被强迫劳作,或者是受利益驱使赚取工资。对于西班牙人而言,波托西城是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财富源泉(“值一个波托西城”成为富裕的固定用语),而对印第安人来说,它是“地狱之口”,首先采矿就相当危险,而使用水银更是致命的(水银是一种有毒物质)。波托西城如此运转了三个多世纪,据估计,总共有800万印第安人——在银矿工作的每十人中就有七人——死于非命。

大量白银从新大陆流出,其中有一半来自波托西城。从1503年到1660年,3200多万磅的白银和36万磅黄金从这里运出。那么它们流向了哪里?是谁对白银有着如此大的需求,以至于波托西城在无人知晓的地方蓬勃发展起来,而西班牙人为了获得白银情愿驱使800万印第安人劳作至死?毕竟征服者曾经想要的是黄

金,并非白银,而他们目前在这里汲取的却是白银。为什么?可以从两方面予以回答。

### 西班牙帝国及其崩溃

由于新发现的巨额财富唾手可得,西班牙统治者试图将整个欧洲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帝国理想(和梦想)在16世纪的欧洲从未远离现实。确实,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一些欧洲人一直渴望重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统一的政治秩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它是东正教的维护者。但是,当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夺取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一个穆斯林城市时,希望破灭了。

在西欧,帝国理想珍藏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记忆中。公元962年,一个半野蛮的日耳曼入侵者夺取意大利,并被教皇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帝国的称号又恢复了,尽管更多的是名义上的和希望中的而非事实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一直维持到1806年,在地域上主要包括奥地利和德意志,尽管德意志本身在政治上甚至比意大利还支离破碎。

不过在16世纪早期,西班牙似乎有可能在欧洲建成一个真正的帝国。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儿子查理五世不仅继承了西班牙王位,而且领有遍及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地(奥地利、尼德兰、西西里和撒丁尼亚)以及新大陆的新西班牙(墨西哥)和新卡斯特尔(秘鲁)。新大陆的财富开始流向西班牙,最初只是掠夺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珍宝所得,而在波托西城的银矿开采之后,那里成为西班牙财富的固定来源。这些使得查理五世和他的继任者腓力二世有了足够的金钱尝试统一他们的领地。不过,西班牙君主统一其领

地的企图遭到法国和西属尼德兰领地的新教徒的阻挠,英国也在必要时援助西班牙的敌人。

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争以及荷兰独立战争(新教的荷兰人反抗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尤为激烈的战斗发生于16世纪70年代)都使西班牙元气大伤。尽管有大量的白银从新大陆流向西班牙,但战争的消耗如此巨大,以至于西班牙王室不止一次宣布破产(首先在1557年和1560年,之后又发生过许多次)。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紧接着西班牙又在欧洲(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和新大陆遭遇了更大的挫败,由此注定了西班牙人创建欧洲帝国之企图破灭的命运。新生事物——民族主权国家竞争体系——将取而代之,西班牙将不再是中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创建帝国机会的丧失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西欧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sup>⑧</sup>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讲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回来解释人们乐此不疲地在新大陆挖掘白银的第二个原因。

### 中国对白银的需求

80 哥伦布冒险穿越不为世人所知的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绘制好望角周边水域的航海图,都是为了绕过穆斯林世界的奥斯曼人和其他人所控制的从东地中海到亚洲的陆路,而直接获得亚洲的财富。当然哥伦布从未到达过亚洲(尽管他认为自己到了那里,并把土著美洲人称为“印第安人”),而当葡萄牙的船只驶入印度洋和中国海域时,他们发现自己太穷了,以至于几乎没钱购买亚洲的香料和制成品(所以他们以“武装贸易”的保护性伎俩勒索商品)。不过,当西班牙人偶然发现新大陆的白银时,他们几乎找到

了获取亚洲财富的钥匙。

问题是,正如一句俗语所说,西班牙“养着奶牛,却喝不到牛奶”。确实有大量的白银从新大陆流向塞维利亚,但是西班牙的统治者,尤其是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却持续不断地进行战争,艰难地尝试将整个欧洲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结果白银又从西班牙流入了荷兰军火商和英国、意大利金融家的手中,然后,这些人就用新获得的白银资本资助到中国 and 印度洋去的贸易使团。而且无论如何,西班牙人没有直接通往亚洲的路线,那些路线正被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控制着。这种状况至少维持到1571年,那一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这样西班牙人就可以把满载白银的西班牙船只从阿卡普勒科直接开往马尼拉。

众所周知,在从1500年到1800年的这三个世纪里,“新大陆出产的白银近3/4”最后都辗转流入中国。<sup>⑨</sup>原因是中国对白银有巨大的需求,既把它当作货币体制的基础,又用它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珍视白银,所以白银在那里非常昂贵,而在南北美洲却非常廉价(在掠夺阶段之后,其价格仅相当于生产价格,而800万印第安矿工的死证明生产价格是相当低的)。因而,从新大陆输出的白银,辗转欧洲和太平洋到达菲律宾,最后都流向了中国。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雄厚、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所以它是带动近代早期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新大陆的白银为它供应能量。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国,就不会有波托西城(或者说至少波托西不会发展成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没有波托西城,西班牙人就不会抱有在欧洲建立帝国的企图。简言之,用当今一位史学家的话说,白银“围绕世界运转,并促使世界旋转”。<sup>⑩</sup>

在 1500 年至 1800 年这段时期里,世界人口、经济活动和贸易的主体都在亚洲,尽管这期间欧洲人在新大陆和亚洲创造了新的开端。<sup>81</sup>事实上,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从 1500 年左右的约 60% 上升到 1750 年的 66%,1800 年的 67%。直到 1800 年,世界上 2/3 的人口都是亚洲人,主体在中国和印度。就像第一章所讨论的,在旧生态体制下,人口增长是国家成功地生产出额外的财富以供养更多人口的标志。

但是,亚洲不单人口增长了,经济产量和经济生产率也提高了。亚洲经济的增长可能始自 1500 年,到 1775 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约 80% 的产品,换句话说,占世界人口总数 2/3 的人(亚洲人)生产着世界上 4/5 的产品。换一个角度来看,1775 年,占世界人口总数 1/5 的欧洲人与非洲人和美洲人一起生产着世界上 1/5 的产品。所以,在 1500 年之后的三个世纪,亚洲人拥有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

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包括新大陆,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在 16 世纪,中国的制成品与欧洲的相比,质量好得多,价格便宜得多,“由于西班牙人受商业利益的驱使,欧洲商品在新大陆的主导地位很快中止了”。秘鲁的西班牙总督在 1594 年对马德里当局抱怨说:

中国商品价格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价格如此昂贵,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不可能把贸易阻止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个王国里没有中国商品消费。既然一个人可以用 200 雷阿尔(25 比索)购买中国丝绸为其妻做衣服,他就不可能花 200 比索为妻子买西班牙丝绸。

在利马,市民们也穿中国丝织衣服,而在墨西哥,妇女们穿的裙子名为中国袍(China poblana),它一直是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的确,中国的进口商品如此物美价廉,以至于破坏了墨西哥的丝织工业,即使在墨西哥丝织工业因为输入中国的廉价丝线而日益发展的时候。<sup>82</sup>

英国人也发现便宜的印度棉纺织品大大优于他们在当地购买的任何纺织品(不管是羊毛织品,还是亚麻织品),以至于 17 世纪时印度进口商品在英国稳步增加。确实,至 1770 年,英国已从印度进口了大量的棉纺织品,在英国纺织品生产商看来,英国纺织业疲于竞争,前景暗淡。因此,1707 年他们成功地迫使英国政府禁止印度棉纺织品的进口,而不是成为效率更高的生产者来同印度竞争。印度色泽艳丽的印花棉布在法国妇女中也相当受欢迎,为了保护本国工业,法国于 1717 年颁布法令,禁止穿着印度棉织品或中国丝织品。巴黎一位商人做得更出格:只要愿意“在大街上剥光穿着印度棉织衣服的妇女”,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 500 里弗赫。<sup>83</sup>

下一章,我将用更多的篇幅阐述纺织品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问题。在这里,仅说下面的内容就够了:尽管有来自新大陆财富,但是到 18 世纪末,欧洲人在与亚洲人所进行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事实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当时的全球形势:欧洲人相对于亚洲人而言如此贫弱,距离工业财富和工业生产的真正创造者仍然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内部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而目的只是为了争夺在亚洲市场进行贸易的优先权。欧洲的边缘地位,换句话说,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欧洲人试图在这个仍被亚洲支配的世界里寻找积累财富和力量的途径。新

大陆再次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 新大陆经济

### 蔗糖和奴隶

新大陆经济的兴起得益于种植园制的建立和发展,它使用从非洲输入的奴隶劳动力,最初从事蔗糖生产,<sup>⑧</sup>不过,最终在17世纪时转向烟草生产,18世纪又转向棉花生产。葡萄牙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曾在巴西试验掠夺殖民地财富的最佳方式。由于没有几个葡萄牙人愿意移民到巴西,葡萄牙人除了依靠土著蒂普\*人别无他法。不过适度地讲,蒂普人并不愿在农场上劳作,他们纷纷逃进森林里。即使将蒂普人变成奴隶,对于解决葡萄牙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无济于事。而且,由于欧洲疾病的传播和蒂普人的进一步减少,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使用非洲奴隶。

甚至在新大陆发现之前,葡萄牙人就已经发明了奴隶制种植园,在非洲海岸的岛屿——他们在寻找通往亚洲的海路的过程中征服了那里——上进行蔗糖生产(借鉴此前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的成功经验)。搞清15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制度得以产生的具体情况,对于理解后来发生于新大陆的事情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这种制度涉及热带雨林变成甘蔗种植园所引起的巨大生态变化,涉及土著居民(关契斯人,Guanches)的奴隶化和灭绝,涉及当时在种植园里生产蔗糖的大批非洲奴隶的输

\* 原书为泰诺人(Tainos),依作者意见改为蒂普人(Tipus)。下同。——译注

入。<sup>⑨</sup>所有这些都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发生的,但是它的确为葡萄牙人建立奴隶制种植园提供了经验,他们很快就把它推广到人口锐减的新大陆,至16世纪80年代,奴隶制和种植园已经成为巴西经济的显著特色。

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很快在加勒比海诸岛屿建立了依靠奴隶生 83  
产的甘蔗种植园。1640年夺取巴巴多斯之后,英国殖民者立即开始开垦土地,建立甘蔗种植园,并在17世纪50年代将大量蔗糖运回母国。蔗糖业在英国殖民地传播得很快,特别表现在英国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牙买加岛(其面积是巴巴多斯的三倍)之后。法国人也在加勒比地区——从马提尼克岛开始——建立了甘蔗种植园,把蔗糖运回法国。到17世纪晚期,如此多的英国和法国蔗糖运回母国,由此导致的市场竞争将巴西蔗糖挤出了北欧。最后,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为生产蔗糖把加勒比海几个岛屿的森林砍伐殆尽,严重破坏了土壤肥力(有海地岛为证),并且也改变了当地的气候。<sup>⑩</sup>

输往新大陆种植园进行劳动的非洲奴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至19世纪奴隶贸易结束时为止,被贩卖的奴隶总人数超过900万。到17世纪50年代,“非洲人已经是定居于新大西洋世界的新移民的主体”。<sup>⑪</sup>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奴隶贩卖商——最初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但后来主要是英国人——每年将数千名非洲奴隶带到美洲。这不仅给非洲社会,也给美洲社会(南美和北美)留下了持久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sup>⑫</sup>但在这里,我们的兴趣点主要落在奴隶种植园制如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

有两条三角贸易路线——三角贸易兴起于17世纪,完善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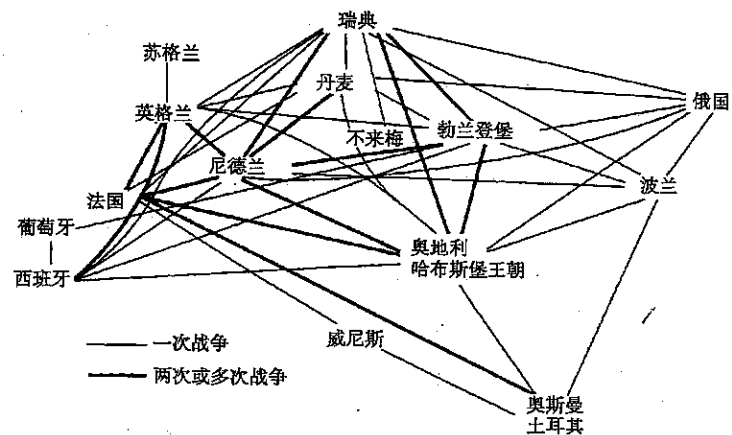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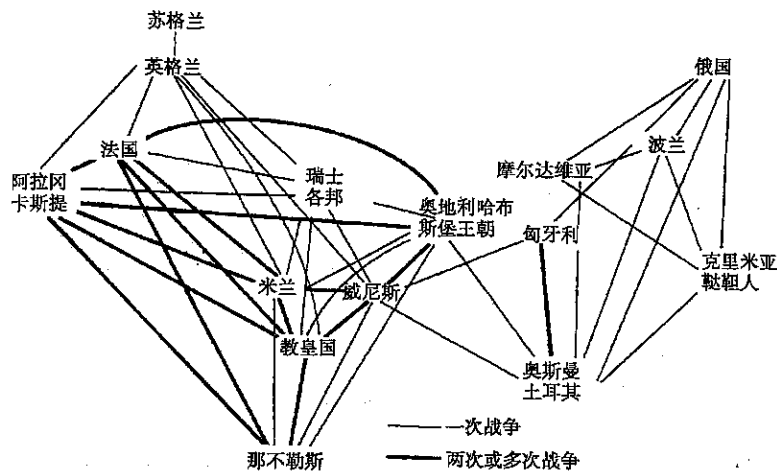
18世纪——连接了大西洋世界。第一条,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一条,是连接英国、非洲和新大陆的三角贸易。英国人将美洲的商品(不仅是蔗糖,也包括来自北美洲的木材和鱼)运到英国(并在那里到达贸易伙伴手中),然后带着制成品(其中来自印度的棉纺织品日渐增多)到达非洲,交换奴隶,最后把这些奴隶运到美洲。另一条三角贸易路线走的是另一个方向,首先把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朗姆酒运往非洲,交换奴隶,然后把奴隶带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再把从蔗糖中提炼出的糖浆运到新英格兰,生产出更多的朗姆酒。<sup>84</sup>

在这些交易中,欧洲人和北美殖民者赚取了钱财,积累了财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加详细地论述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如何救助欧洲人,并促使他们在世界经济中更加有效地竞争。现在我们只需知道,17、18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参与被亚洲生产商主宰的

84 世界经济竞争,而且彼此之间也展开激烈竞争。西班牙人创建欧洲帝国之企图的破灭很快就导致了一种新体制的建立,它连接了欧洲各国,并且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及其力量的壮大。

### 欧洲国家体系

战争决定了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17世纪中期之前,战争主要是阻止西班牙建立帝国或者是支持新教徒(荷兰和德意志诸邦的新教徒)摆脱西班牙天主教君主的控制以获得独立。自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以来,战争主要针对法国,因为西班牙衰落之时,法国已经财大气粗。17世纪晚期以来,战争主要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在七年战争(1756—1763)或美国



图表 3.1: 欧洲国家共同参加大国战争,1496—1514年,1656—1674年

资料来源: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00), 176-177.

人所谓的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时期达到顶峰,英国最终战胜了法国。

在本章所考虑的时期内(即从1500年到1775年),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在许多方面具有历史性意义。首先,这些战争实际上涉及欧洲所有国家,很显然,战争把它们都连接在了一个单一体系中,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以后更是如此。这可以从历史学家查尔斯·蒂莉已绘制好的两个图中相当清楚地看出(见图表3.1)。<sup>④</sup>这两个图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时期(1500年前后的欧洲和1650年前后的欧洲),其中细线代表相关国家间发生的一次战争,粗线代表两次或多次战争。1500年,欧洲还存在两个子系统,其中西欧以意大利为中心,但到1650年,所有欧洲国家都纷纷卷入一系列共同的战争纠纷中。

第二,欧洲的战争不仅将欧洲各地区合并进日益减少的几个政治单元中,而且促进了一种特定类型的民族国家的发展,使之成为欧洲最成功的政治模式。蒂莉的图表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基本数据,约从公元1000年开始,3000万左右的人居住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欧洲的地方,他们生活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单元里,为首的是“皇帝、国王、诸侯、公爵、哈里发、苏丹和其他统治者”。蒂莉警告我们,这些称号不能掩盖欧洲政治支离破碎的事实:在意大利一地,就有200到300个城市国家。500年以后,约在1500年,“欧洲的8000万人分属于大约500个国家(states)、准国家(would-be states)、雏形国家(statelets)和类似于国家(statelike)的政治组织里”,自此以后,战争不断削减欧洲国家的数目,直到现代,只剩下30个左右。<sup>⑤</sup>

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疆域太大、效率太低,难以动用自身的资

源对抗英国人或法国人,而富裕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则因缺乏人力而无力反击意大利以外更强大的敌人。同样,德意志各邦尽管彼此之间足以自卫,但要阻止更强大的国家干涉其内部事务却相当困难。而像瑞典或荷兰之类的小国家,虽然靠自己的资源在17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到了大国开始主宰欧洲政局的18世纪,也逐渐走向了政治边缘。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诸如波兰,一小撮贵族统治着大批的农奴化农民,难以派发足够数量的军队进行战争,所以波兰在18世纪末被瓜分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战争的第三个有趣的影响是它推动欧洲国家内部演化的方式:它有利于某些类型的国家而不利于另一些类型的国家。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并不富裕,而战争消耗却极大。从根本上讲,欧洲统治者可以开发两种收入来源。首先,他们可以征税。不过税收经常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因此为了获得征税和使用税款的权利,大多数欧洲统治者不得不与大土地所有者协商,结果常常导致某种代表会议的创立,在征税或提高税额之前,统治者须征求它的意见。除大土地所有者的会议外,另一种与税收有关的机构——国家官僚机构——成长起来,它对于向已知臣民分派和征收税款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避免把征税权“承包”给私人团体。这两个进程中出现的紧张局势是1500年至1800年间欧洲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史的主要内容。

第二种收入来源是向银行家或其他富豪贷款。例如,16世纪的西班牙君主不得不贷款资助战争,而大多数贷款都来自外国的或不受西班牙控制的银行家。由于所有的欧洲统治者都得靠短期和长期贷款进行战争,所以他们乐意鼓励那些携带资金的人定居在本国的城市里,英国君主和荷兰君主在这方面最为成功,部分原

因是他们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愿意吸收在天主教世界里不受欢迎的富有的新教徒和犹太人。不过即使贷款来自本国臣民也得偿还,这促使英国在17世纪末创立了“国债制”,这项发明在增强英国扩张势力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实际上,英国的国债是由英格兰银行作担保的长期贷款,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债券”。其他欧洲统治者常常试图把短期债务变成长期债务,以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但是这样做是否成功依赖于统治者的偿还能力。英国的发明是通过英格兰银行(创建于1694年)发行债券,以银行签名的资金作保证。国债不仅为英国统治者预先备好进行战争的现金,而且给了投资者相对保险的投资手段,从而也为英格兰银行吸收了更多存款。

总而言之,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耗资巨大,远远超过了欧洲人在购买亚洲商品之后手中剩下的白银数量,致使欧洲出现了常备军和海军、税收和负责征税的国家官僚机构、纳税人为了在税收数额上施加影响而要求建立的各种代表会议(尽管欧洲的“绝对君主们”尽最大努力不理睬或随意停止这些会议),以及公共债务和国债制度。所有这些都是17、18世纪欧洲“国家建构”历程的组成部分。

### 国家的建构

虽然欧洲统治者为了获得战争所需的资源,在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但是他们更乐意臣民们更加自愿地把那些资源交给国家。因而统治者发表各种合法性的声明,即宣扬臣民应该自愿服从统治者的思想。在16、17世纪,这些合法性声明是以宗教为依据的,表述成“国王的神圣权利”,即这是基督上帝赐给他们的统治权利。

这些宗教性声明也促使欧洲君主们,特别是天主教君主从他们的领地中驱逐异教徒。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称其为“摩尔人”)的驱逐是一个较早的例子,17世纪后期法国人对新教徒(胡格诺派教徒)的迫害也是如此。西班牙宗教法庭也参与进来,以保证西班牙在欧洲和美洲属地的子民信奉天主教,忠诚于皇帝。

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开始挑战君主统治的“君权神授”思想,设想了许多以个人权利的建构为基础的更为民主的政体。在反对法国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的斗争中,法国“启蒙思想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开始把被管理者即“公民”的同意也囊括至国家建立的合法性的基础中。到18世纪末,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法国人正是利用这种思想来证明处决国王、建立共和国的正当性。<sup>87</sup>

在欧洲这样一个竞争激烈、战争频繁的环境里,一些国家脱颖而出,最终致使一种特定类型的国家——它既有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大城市,也有人口众多的边远乡村,从资金和人员两方面维持军队给养——成为成功的政治模式。因为某些我们在此不需关注的原因,大约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世纪里,欧洲城市发展起来,且在地域排列上呈带状结构,从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开始,向北穿越阿尔卑斯山,延伸至根特、布鲁日和伦敦,巴黎也发展起来。直到今天,这一带状地带仍是欧洲最为城市化的地区。城市为本国统治者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他们可以征收城镇贸易税,获得银行贷款,从而可以摆脱对乡村贵族的依赖,并从整体上壮大自己的势力。总而言之,他们可以比远离城市的运气较差的竞争者支配更多的资源,尤其是钱财和人力。<sup>88</sup> 特别是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的



统治者把在伦敦或巴黎发现的资金资源与从乡村人口中发掘的人力资源相结合,从而证明自己是最有能力建立这类国家的。强大的国家建立之后,英国和法国在17世纪晚期开始成为激烈的竞争对手。

英国统治者愿意而且有能力把国家权力用于经济目的。在反对竞争对手荷兰的斗争中,英国于17世纪中期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条例,旨在垄断新大陆英属殖民地的贸易,而且为了推行这些条例,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sup>89</sup>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使新教君主登上了英国王位,他们同意遵守议会制定的以保护国内制造业利益为主旨的法令。170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一项限制印度棉纺织品进口英国的法令,以维护英国生产商的利益,鼓励本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以至1700年,英国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用一位英国史学家的话说,“(她)已准备好使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服从于经济目的,其战争目标也是商业性的”,她的外交政策的“成形”受到了来自生产商的压力的影响。<sup>90</sup>

### 重商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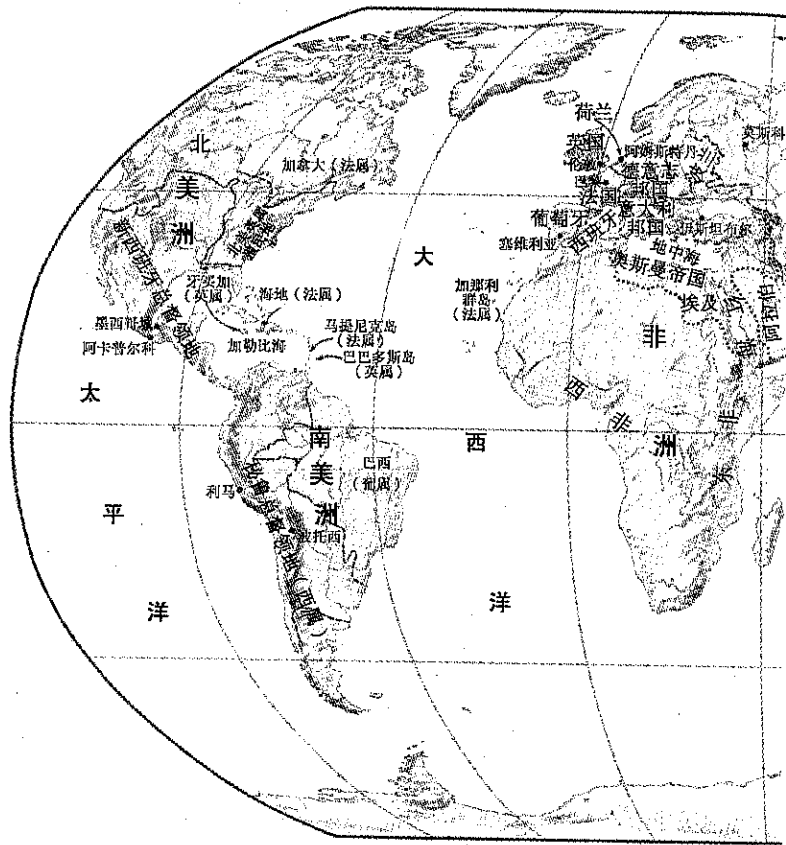
至于法国,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在17世纪末,在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的领导下,推行所谓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欧洲统治者似乎总是缺少足够的钱支付战争,甚至在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人就抱怨说,“经验表明,在船只从西印度返回的一两个月之内,所有的钱都花的一干二净”。到17世纪20年代,一位英国商人同样抱怨“钱币短缺”。<sup>91</sup>原因是,尽管欧洲的货币储备增多了(尤其是从1580年到1620年这一段时期),但是随着欧洲银矿开采的崩溃,美洲白银的减少,流向亚洲的白银的日

渐增多,到16世纪20年代,欧洲货币储备量可能已减少。所以,欧洲各国不仅在战场上彼此拼杀,而且竞相吸引和储备尽可能多的金银货币。

在欧洲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似乎只有一个国家有所失,另一个国家才会有所得:这是一个国家对抗所有国家的战争,“力争第一”是最高原则。根据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一个国家获得优势的最好方式是尽可能地吸收和储备世界上的贵金属,特别是白银(后来是黄金)。需要储备金属货币的原因很简单:战争耗资巨大,武器需要购买,在许多情况下还得向本国之外的武器制造商购买,<sup>92</sup>以外国为战场的战争需要大量白银或黄金。为了在自己国内储备贵金属,就需要制定经济政策禁止购买任何进口商品,尤其是消费品和非战争用品,以防止贵金属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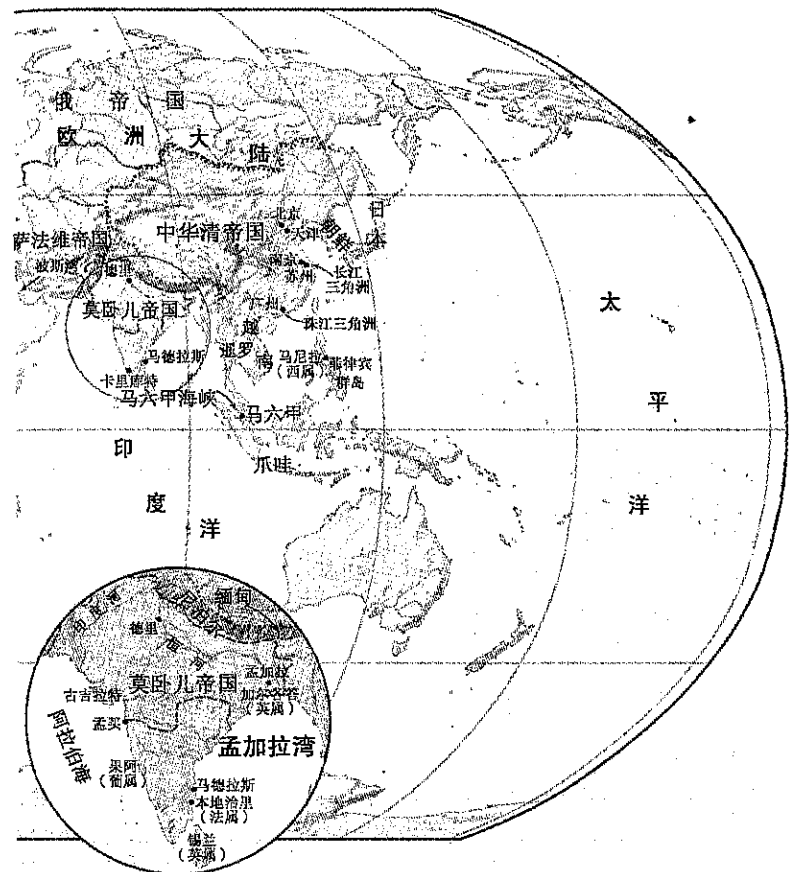
所以,欧洲国家几乎向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命令所有商品必须由本国船只运送,并强制欧属美洲的殖民者只与母国进行贸易,尽管走私贩卖使这一政策有些许漏洞。重商主义思想也引发了这样的政策,即国家应该使用本国的原材料在边界之内生产所有需要进口的商品,我们看到英国在18世纪早期就采取了这样的举措来抵制印度棉纺织品。尽管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确导致了工业在欧洲各国的建立,但是工业化本身并非重商主义的目标,它的目标是阻止金银外流富裕他国。欧洲各国普遍痴迷于储备白银,一个德国人曾经说:“白银越多,国家越强大。”<sup>93</sup>

在欧洲内部的这些战争中,各种类型的国家都走过了兴衰荣辱的命运历程。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16世纪末,西班牙的势力开始衰落,葡萄牙因为国家太小,在欧洲无力迎战法国(或西班牙),在亚洲海域难敌荷兰。荷兰,作为最先在亚洲和美洲投



地图 3.1: 1760

资发展贸易事业的欧洲国家之一,在 17 世纪进入发展的巅峰期,而那时正值法国和英国积蓄力量的时期。但是,因为没有人力建立足够大的常备军对抗法国,荷兰人最终被迫与英国结盟共同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到 18 世纪,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竞争力的两个国家。(见地图 3.1)



1756 年后的世界

###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

作为欧洲最强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不仅在欧洲 90 竞争,也在美洲和亚洲展开争夺。在从 1689 年到 1815 年的“延长”的 18 世纪里,英国和法国共进行了五次战争,其中仅有一次不是英国最先发动的。1713 年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结束了英法参与(还有其他国家)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建立了欧洲“势力均

衡”原则,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主宰其他国家。尽管如此,英国和法国之间周期性的战争仍在继续。

- 91 两国之间最著名的战争是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美国人称之为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并以它对1776—1783年美国(反英)独立战争的影响这一视角来阐释这场战争。确切地说,英法两国开战的导火索在美洲殖民地,事实上是22岁的乔治·华盛顿点燃了它。<sup>③</sup>但是它却演变成一场全球性战争,或者说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在美洲殖民地的原始森林里,在加拿大,在非洲,在印度和欧洲展开了激烈战斗。结局对法国人而言
- 92 是灾难性的:他们丧失了北美(英国人夺取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相反,英国的势力更加强大,最终确立了自己在北美和印度的主宰地位。<sup>④</sup>

因而,至1775年,欧洲国家的建构进程导致了一种打上战争烙印的制度的创建,它有利于某种特定类型国家的发展,英国和法国国家的建立可以引为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势力均衡——而不是一个统一帝国——成为欧洲的既定原则,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它距离此目标还甚远。当然,在18世纪早期,印度莫卧儿帝国正日趋衰落,而且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英国也已经开始在那里创建一个殖民帝国。但是英国的势力还是太小,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定的贸易原则。不过他们曾经试图这样做,最著名的一次发生于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无可奈何。尽管如此,大不列颠岛却非常幸运地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当马嘎尔尼乘坐的船只返回伦敦时,那里甚至已经出现了蒸汽机。而当英国学会

把工业革命的成果运用到战争时,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全球均势天平倾斜了。这将是下一章的内容。

## 注 释

- ① 关于这两种迥异的政治经济的学术比较,见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rt 2.
- ② 见 Takeshi Hamashita, “The Intra-Regional System in East Asia in Modern Time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3.
- ③ 见 Geoffrey Parker and Lesley 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 ④ 要了解一些例外的情况,见 C. A.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1993).
- ⑤ 最近在秘鲁卡拉尔的考古发掘可以把城市和长途贸易出现的时间远远地提前到公元前2600年前后,关于该发现的最初报道,见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7, 2000, p. 1.
- ⑥ 人类也许早在35000年前就迁徙到美洲,但学者们的共识是在公元前15000年前后。见 Richard E. W. Adams and Murdo J. MacLeo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vol. 2, part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
- ⑦ 发音为“Me-shee-ka”。19世纪的历史学家开始称这些人阿兹特克人,依据的是他们可能的发源地 Aztlán.
- ⑧ 战俘在墨西哥的宗教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墨西哥人相信——或至少他们的神甫告诉他们——是他们个人的献祭使得众神推动宇宙运转,为了维持世界的运行,特别是为了保证太阳在每天早晨升起,有必要通过人的宗教献祭来取悦众神。因此在中心祭坛的杀戮成为日常的宗教行为。另外,墨西哥人尤其钟爱战神 Huitzilopochtli,而此神要求额外的献祭,当供奉此神的庙宇于1487年竣工时,据说有80000人被杀以祭祀该神。
- ⑨ 如另需深入了解,见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New

- York: W. W. Norton, 1998), chap. 3.
- ⑩ Bruce G. Trigger and Wilcomb E. Washbur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vol. 1,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rt 1, 361-369.
- ⑪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 1.
- ⑫ 要获得一个简明的概述,见 Thomas A. Brady, Jr.,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1400-1700: A European Counterpoint," in James D. Trac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7-160.
- ⑬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Spanish Profitability in the Pacific: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Dennis O. Flynn, Lionel Frost, and A. J. H. Latham, eds., *Pacific Centuries: Pacific and Pacific Rim History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9), 23.
- ⑭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31.
- ⑮ 从上书第4章中寻找本段所引述的资料。
- ⑯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part 2, 400-402.
- ⑰ 引自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178.
- ⑱ 关于蔗糖和奴隶的故事,可以参见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5), 以及 Bethel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s. 1-2.
- ⑲ 见 Alfred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 4.
- ⑳ 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 6.

- ㉑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
- ㉒ 见 Herbert S. Kle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 ㉓ 正如在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中所描述的:“奴隶贸易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英国的产品和印度的商品运到西非换取奴隶,奴隶又被带到美洲换回蔗糖、烟草和其他热带产品,这些东西随后在英国出售,并被加工成消费品,也可能是再出口品。”
- ㉔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 D. 900-199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176-177.
- ㉕ 同上书, 38-43. Tilly 认为在 1990 年有 25 或 28 个国家,当然,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其附属国脱离后这一数字改变了。
- ㉖ 关于人民主权思想在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史, Edmund S. Morgan 的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1988) 具有启发意义。
- ㉗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47-54. 在 Tilly 看来, 周围地区与这些城市的接近度导致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欧洲国家的建立。富庶城市可以自己花钱雇佣军队(国家建立的“资本集约型”道路), 远离城市及其资金的统治者不得不依赖乡村贵族调动的军队(国家建立的“权力集约型”道路), 而城市与周围乡村联系比较便利的地方则通过联合的方式。Tilly 坚持认为, 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以最后一种方式所建立的国家在竞争激烈的欧洲国家体系中是最为成功的。
- ㉘ 关于航海条例, 见 John J. McCusker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46-50.
- ㉙ 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1968), 49.
- ㉚ 引自 Geoffrey Parker,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nance in Europe 1500-1730," in Carlo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1974), 530.

- 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军队所需的许多东西不能在西班牙半岛得到,他试图建立工厂以生产枪炮和其他急需品的不断努力总不能实现,相反,在西班牙人看来,国王的精力其实许多时候不在国内,而那里应该是经济活动和武器生产的中心……这样,举例说来,邻近西属尼德兰但不属西班牙统治的列日主教辖区就成为荷兰战争所需武器的生产基地,提供着西班牙和荷兰这两方军队所需的大部分物资。”见 William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13。
- ㉑ Werner Sombart, 引自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2, 545。
- ㉒ Fred Anderson 的 *Crucible of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对这些事件及乔治·华盛顿所发挥的作用有引人入胜的叙述。
- ㉓ 依据 E. J. Hobsbawm, “The result of this century [18th] of intermittent warfare was the greatest triumph ever achieved by any state [Britain]: the virtual monopoly among European powers of overseas colonies, and the virtual monopoly of world-wide naval power.” 引自 Andre Gunder Frank,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237。



## 第四章 工业革命及其影响, 1750—1850 年

1750 年,世界上 7.5 亿人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他们在哪<sup>95</sup>里,也不论他们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如何——均繁衍生息于旧生态体制之中。生活所需的一切,包括食品、衣物、住房,以及取暖和做饭所用的燃料,都来自于土地,取自于太阳光每年赐予地球的能量。同样,以纺织业、皮革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工业也依赖于农业或森林的产出。即使在旧生态体制下所冶炼的铁和钢也仰仗于由木材加工而来的木炭。因此,旧生态体制不仅限制了人口增长,而且也限制着生产能力。

所有这些都将在从 1750 年到 1850 年的一个世纪中发生改变,那时,人们日益利用煤来提供热量,并把这种力量用于推动蒸汽机的往复运转。<sup>①</sup>煤的使用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把人类社会从旧生态体制下解放出来,进入一个不再年复一年地靠太阳光提供能量的新时代。煤几亿年前埋在地下,是储存的太阳能。它在蒸汽机上的使用使人类社会摆脱了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使生产能力和人口数量能够呈指数增长。燃烧煤产生的蒸汽代替风、水和畜力